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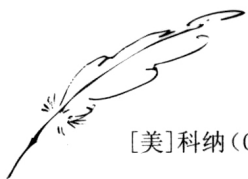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剑桥圣经注疏集

中文版主编 ● 卓新平



[美]科纳 (Craig S. Keener) ● 著

《哥林多前后书》释义

I-2 Corinthians

郇元宝 ● 译 陆点 ● 校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剑桥圣经注释集

中文版主编 ● 卓新平



《哥林多前后书》释义

I-2 Corinthians

[美]科纳(Craig S. Keener) ● 著

郇元宝 ● 译 陆点 ● 校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哥林多前后书》释义 / (美)科纳著; 郇元宝译, 陆点校.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经典与解释·剑桥圣经注疏集)
ISBN 978-7-5617-6709-2

I. 哥… II. ①科… ②郇… ③陆… III. 圣经—注释 IV. B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5077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1-2 Corinthians

by Craig S. Keener

Copyrigh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0 West 20th Street, New York,
NY10011-4211, US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Syndicate of the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Englan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7-010 号

剑桥圣经注疏集

《哥林多前后书》释义

(美)科纳 著

郇元宝 译

陆点 校

责任编辑 倪为国 何花

封面设计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总机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插页 2

印张 15.75

字数 375 千字

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17-6709-2/B.497

定价 49.80 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者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古典教育基金·正则资助项目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40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80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

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剑桥圣经注疏集”出版说明

卓新平

基督宗教在其发展与传播中,《圣经》翻译及诠释起着重要作用。《圣经》译解既已成为基督宗教神学中的基础,亦已成为西方和中国翻译史中的重要一环,注解、诠释更直接促成了经典理解上语言解释学、文献解释学以及神学和哲学解释学的诞生及发展。翻译乃解释的一种基本形式,而其“译”和“释”均展示出一种“理解的艺术”、成为“沟通的桥梁”,因而在人类文明交流、各种文化沟通中举足轻重,本身就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组织翻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版圣经注疏集(The New Cambridge Bible Commentary)”,是世界著名高校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在21世纪初为英语世界推出的一套最新最权威的圣经注疏集丛书。这套丛书基于圣经学的学科视域,以当代圣经著名学者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基础,采用科学严谨的学院派研究方法,尝试从更为宽泛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理解《圣经》文本、诠释经文内容;特点是

系统性强、研究深入、特别注重细节,形成了宏观整体把握与微观重点探究的有机结合,使人们得以清晰地认识《圣经》的脉络神髓和重要内容,提供了当前国际上圣经学术研究中的最新理论观点和重要问题意识。从这一意义上讲,“剑桥版圣经注疏集”以其独立的学术立场、缜密的历史考证、必要的背景材料、丰富的文献内容超越了以往教会释经、圣经神学的视野,有更新颖的理论见解和更扎实的学术内容。

《圣经》翻译历史悠久,亦折射出探究、解释上的艰辛与风险。从《圣经》各种版本来看,其翻译历史大致经历了由古典语言的翻译到近现代语言的新译过程。重要的古典翻译及相关版本很多,包括公元前3世纪用希腊文所译希伯来文《圣经》(即史称《旧约》部分)而完成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公元5世纪哲罗姆译成的《通俗拉丁文译本》、8世纪英国人比德的古英文译本,14世纪英国学者威克里夫所译英文本《旧约》,17世纪牛津大学史密斯主持完成的英文《钦定本圣经》(亦称《詹姆斯王本》),19世纪的《钦定本修订版》(即1885年出版的《英文修订译本》,为此后中文《和合本》所参考的英文译本),以及12世纪的法译本《圣经》、19世纪的拉丁文、法文对照的《卡里埃译本》和16世纪马丁·路德的德译本《圣经》等。20世纪以来,较为著名的现代西文《圣经》翻译则有英译本1901年版《标准本圣经》、1952年版《标准本修订版圣经》、1945年版《增订本圣经》、1966年版《当代福音圣经》、1970年版《新英语圣经》和《新美国圣经》、1971年版《新美国标准本圣经》,1971年版《当代圣经》(即《活泼真道》),1976年版《今日英语圣经》,1979年版《福音圣经》、1986年编订的《综合圣经》,以及法译本1955年版《耶路撒冷圣经》和德译本1980年版《统一译本圣经》等。

如果说《圣经》古典译本乃基本上由教会或国家权威所统摄、规定,那么我们则会看到,近现代译本实与学术创新、独立思

考和思想解放相关联。这种翻译努力不仅使《圣经》走入了广大普通读者之中,还成为西方一些国家近代民族语言的诞生或完善的重要标志。例如,14 世纪的威克里夫最先尝试将《圣经》从古典拉丁文翻译为近代通俗英语,但其创新努力也导致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6 世纪的德国学者马丁·路德在其宗教改革的实践中亦把《圣经》译成了德文,译文实际上代表或标志着近代德文的最早亮相。

据相关学者统计,目前《圣经》的“新旧约全书”已被译为 363 种语言,使用这些语言者占全世界人口的 76%;此外,《新约圣经》已被译为 905 种语言,而《圣经》部分经卷则被用约 930 多种语言翻译出版。从总体来看,《圣经》全书或部分片段已被用约 2200 种语言翻译出版。尤其《圣经》的英译有着广远的影响,自 19 世纪以来推出的各种《圣经》英译本,在许多国家获得广泛应用,中国也非常流行。著名版本包括《新英语圣经》、圣经的《新国际译本》、《福音圣经》、《活泼真道》等。随着《圣经》英译本的增多,英语世界的圣经学者开始重视《圣经》注释、解说,逐渐推出了这类具有研究性、学术性的《圣经》注释书。在 20 世纪 60 年代,著名的《牛津新注释书圣经》问世,受到了欢迎和好评。至 20 世纪末,美国学者托马斯·奥登组织了题为《古代基督宗教圣经注解》的多卷本、多语种的《圣经》原典注释工作,现已出版十余卷,涉及英、德、法、俄、西班牙、阿拉伯和汉语等语种。正是这些注解和研究工作,为当代“剑桥圣经新注解”的研究和出版做好了准备、提供了条件。

《圣经》的中文译本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景教文献”,如景教碑文中载有“经留廿七部”之说。当然,这一最初的汉译《圣经》尝试很不系统,多为散译,且因“入乡随俗”而乃以佛、道术语移译,故此表意亦不是很准确。在元朝,据传天主教来华传教士孟高维诺也曾用蒙文译经,但仅译成个别经卷和章节,也

没有流传下来。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真正开始了汉译《圣经》的工作。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著译中,留下了大量《圣经》内容的中文表述,其中较为集中的有利玛窦所编《畸人十规》,阳玛诺编译的《圣经直解》和《天主圣教十诫真诠》等。他们在中文翻译上的遣词造句则得到了不少中国文人学者的帮助、润色,这亦形成了此后外国传教士汉译《圣经》的一种传统,一批批中国学者成为这些汉译《圣经》背后的“无名英雄”。不过,这一时期的《圣经》汉译只是部分翻译,且基本上没有出版,其中较为著名的包括天主教传教士巴设所翻译的圣经四福音合参《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以及贺清泰汉译的《古新圣经》等。新教来华传教士马礼逊曾在大英博物馆抄写巴设的汉译《圣经》手稿,从而为他自己后来的汉译《圣经》工作创造了条件。

较为整全的《圣经》汉译本始于基督新教传教士马士曼、马礼逊等人。这些《圣经》汉译本包括《马士曼译本》,由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在懂中文的阿美利亚人拉沙帮助下译成,1816年出版新约,1822年在印度出版旧约;《马礼逊译本》,称《神天圣书》,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译成,1814年在广州出版马礼逊独自译完的新约,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两人合译的旧约;《四人小组译本》,由新教传教士麦都思、马儒汉、郭实腊、裨治文修订马礼逊的《神天圣书》而完成,1837年在巴达维亚出版新约,定名《新遗诏书》,亦称《麦都思译本》,1840年出版包括旧约的《神天新旧遗诏圣书》;《委办译本》,由新教传教士麦都思、施敦力、美魏荣、裨治文、金亚德等译完新约,1852年出版,分为“神”字和“上帝”字两种版本,旧约则由新教传教士理雅各与中国学者王韬合作译成,1854年出版,其新旧约合并本1867年出版;《裨治文译本》,由新教传教士裨治文、克陛存、文惠廉、基顺、白汉理译成,1859年出版新约,1862年出版旧约;《高德译

本》，由新教传教士高德、罗尔梯、秦贞等修订《马士曼译本》而完成，1853年在宁波出版新约，定名《圣经新遗诏全书》，1868年出版包括旧约的《圣经新旧遗诏全书》，1883年又在上海出版其附加有参考资料的全译本；《郭实腊译本》，为新教传教士郭实腊根据《麦都思译本》而订正的新约译本，定名《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1836年后在新加坡出版；《怜为仁译本》，为美国新教传教士怜为仁汉译的部分圣经书卷，1849年后陆续在广州、香港出版；《胡德迈译本》，为英国新教传教士胡德迈所译部分圣经书卷，自1850年在宁波陆续出版；《北京官话译本》（即《北京官话新约全书》），由新教传教士丁韪良、艾约瑟、施约瑟、包约翰、白汉理合译，1866年出版，包括“天主”、“神”、“上帝”这三种译名的版本；《施约瑟译本》，由美国传教士施约瑟所译，其《旧约官话译本》于1874年在北京出版，《浅文理译本》（亦称《二指版》）于1902年在日本出版；《杨格非译本》，由英国新教传教士杨格非所译，包括《浅文理译本》和《官话译本》，其中《浅文理新约译本》1885年出版，旧约“雅歌”1905年出版，《官话译本》1889年出版，1893年出版其附有注解的“福音书”；以及《和合译本》（简称《和合本》），包括湛约翰、艾约瑟、惠志道、谢卫楼、沙伯、皮尧士、庐壹合译的《深文理和合译本》，1906年出版新约，包约翰、白汉理、纪好弼、汲约翰、叶道胜、潘慎文、戴维思合译的《浅文理和合译本》，1904年出版新约，二者合并包括汉译旧约的《文理和合译本》于1919年出版，而最为流行且仍被广泛使用的则是狄考文、倪维思、白汉理、富善、文书田、海格思、布蓝菲、鲍康宁、鹿依士、克拉克合译的《官话和合译本》（亦称《国语和合译本》），1919年出版，并于1988年由联合圣经公会再版《新标点和合本圣经》，而由南京爱德印刷公司出版的简化字与现代标点符号《和合本》至2007年底已经印刷5000万册。

自《和合本》出版之后，中国学者开始积极参与汉译《圣经》

的活动。早在1908年,严复就曾汉译《马可福音》(即《马可所传福音》)前4章在上海出版。在基督新教汉译圣经的进展中,1929年由朱宝惠与美国新教传教士赛兆祥合译的《新约全书》出版,此后朱宝惠又独立重译,于1936年出版其新约修订本;1931年许地山曾汉译《雅歌》出版;1933年王宣忱所译《新约全书》在青岛出版;1939年,郑寿麟与陆亨理合译的《国语新旧库译本新约全书》在北平出版;1946年,吕振中在北平出版所译《新约译本》,习称“吕振中译本”,1952年其《新约新译修稿》在香港出版,1970年其汉译《旧约》出版;1964年,萧铁笛所译《新译新约全书》在香港出版;1974年由汉译《活泼真道》而成的《当代福音》新约出版,1979年其旧约译成后名为《当代圣经》出版;1975年,许牧世、周联华、骆维仁合译的《现代中文译本圣经》新约出版,其新旧约全书则于1979年出版;1987年,《新约圣经恢复本》出版;由1972年组成的“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汉译的《圣经新译本》则于1976年出版新约,1992年出版旧约;此后,《国际中文译本》、以及基督新教与天主教合作的《合一圣经译本》亦在翻译出版中。

在天主教汉译圣经方面,德雅的《四史圣经译注》于1892年问世,李问渔的《新约全书》于1897年出版,马相伯的《福音合参》1948年出版,吴经熊所译《圣咏译义》1946年出版,其《新经全集》1949年出版,李山甫、申自天、狄守仁、萧舜华合译的《新经全集》于1949年在天津出版;1954年,耶稣会徐汇总修院所译《新译福音初稿》在香港出版;1955年,狄守仁编译的《简易圣经读本》在香港出版;1956年,萧静山所译《新经全集》在台湾出版。在天主教汉译圣经中最有影响的译本乃是由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雷永明组织翻译的《思高圣经译本》,其新约译本于1962年在香港出版,新旧约全书于1968年出版,现已成为中国

天主教使用的权威中文译本,并于1992年获准在中国大陆印刷出版。此外,当代天主教汉译圣经还包括1999年出版的附有灵修注释的《牧灵圣经》等。

在当代中国大陆,汉译圣经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1979年,丁光训主教曾组织王荫荫、陈泽民、骆振芳等人修订、重译《和合本》,先后完成“诗篇”、“四福音”、“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的重新汉译,但这一工作尚未完成。此外,中国天主教自1985年在金鲁贤主教主持下也曾根据《耶路撒冷圣经》英译本汉译出版了新约部分经卷,不过这一汉译也仍在进行之中。

虽然,《圣经》的翻译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注疏”的过程,但长期以来学界尚不能将这种“注”与“疏”加以展开和深入,只是仅仅依附于《圣经》经文来论说。因此,对《圣经》的系统、详尽“注疏”就在这种初步“翻译”的基础上得以深究和完善。这种“注释”既有历史的考辨、亦有哲学的思索,其学术性、研究性由此而凸显。这套由剑桥大学出版社系统出版的“圣经新注疏”,说明具有学术研究意义的现代圣经文本“注疏”已进入细节,开始重视微观探讨。成果自然会使我们更为客观、更加理性、更能基于历史真实地来认识并理解《圣经》,同时也让我们由此而感受到当代圣经研究的学术脉搏之跳动,对之有着一一种近距离的追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套注解丛书的英文版刚问世不久,其汉语译本就得以推出,译者都是学有专长、英文娴熟的中青年学者,体现出一股朝气与活力。他们的学术努力和精心推出的译作,显然会弥补我们当前在汉译《圣经》上的滞后,开辟出一条了解研究《圣经》的新径。这样,在我们总结、审视《圣经》汉译历史、考虑《圣经》在当代中国应如何得以重新翻译之际,我们推出了“剑桥版圣经注疏集”汉译本,它给我们今后的汉译《圣经》带来

了希望和启迪,也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喜悦;更有价值的是,圣经的翻译、注疏及理解,对于汉语思想界理解西方的思想传统是不可或缺的。

2008年6月24日于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序 言

接到撰写本书邀请后几个月,我做了一次旅行,事实证明,这次旅行决定了本书的雏型。2001年,我得以完成迟延已久的心愿,赴尼加拉瓜从事教学和讲道。作为马纳瓜第一浸信会牧师、教会合一协会 CEPAD 和公共医疗机构天佑会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帕拉霍恩(Gustavo Parajón)医生的客人,我有幸跟尼加拉瓜全国各地的老师和同学共同研读《雅各书》。本书每一页都见证了帕拉霍恩医生和各位牧师所给予的帮助。另外,更加令我受益匪浅的是罗宾斯(Vernon Robbins)的著作。在《探索经文文本内涵》(*Exploring the Texture of Texts*)一书中,他谈到了释经分类法,并主张释经应该包括对讲道内涵的分析,他的观点确立了本书的框架。

这套丛书的主编本·威瑟林顿三世、剑桥大学出版社文史编辑安德鲁·贝克(Andrew Beck)、路易斯维尔学院院长吉姆·刘易斯(Jim Lewis)和该学院教师及校董会不断给予我极大支持,非常感谢!

谨以本书献给教会,为纪念我的双亲——已故的弗兰克·布罗森特牧师和露茜儿·布罗森特,同时衷心感谢“我的姑娘